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官话类编

上

[美] 狄考文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分卷主编　翟赟　郭利霞　陈颖

官话类编

上

[美]狄考文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话类编：全二册 / (美) 狄考文编著. —影印本.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8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588-6

Ⅰ. ①官… Ⅱ. ①狄… Ⅲ. ①汉语—口语—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近代
Ⅳ. ①H1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95716号

书　　名	官话类编（上下）（影印本） GUANHUA LEIBIAN
著作责任者	［美］狄考文　编著
责任编辑	宋思佳　宋立文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88-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027
印 刷 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54.75印张　359千字　1插页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98.00元（全二册）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总 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鳟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迩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迩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簃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

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蒐、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

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读

翟 赟

自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①]入华之后，1829年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②]来华，由此拉开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美国对华传教活动的序幕。（张西平，2009：56）晚清时期著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就是其中的一员。关于狄考文，很多前贤都做过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宗教和教育三个方面，尤其关注的是他对近代中国教育的贡献，但对他编写的《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Based on Idiom*）这部书不够重视。目前来看，有关《官话类编》的研究成果不多，比较早的有太田辰夫（1964 / 1995）、邢公畹（1990）、张美兰（2007、2008），近些年来有一些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如李蕊（2010）、李木谢子（2011）、钱鸿儒（2013）、李银菊（2013）、李婧超（2014）、齐灿（2014）、栗源（2015）。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官话类编》，现将该书体例与内容进行简要的梳理和介绍。

一、狄考文及其在华活动

狄考文，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传教士。1836年1月9日出生在宾夕法尼亚

① 马礼逊，英国人，西方近代第一位来华传教士，编纂了《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等，1834年在广州病逝。

② 裨治文，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晚年主要从事《新旧约全书》的翻译工作，1861年在上海去世。

州（Pennsylvania）坎伯兰县（Cumberland County）一个基督教家庭。1855年进入杰斐逊学院（Jefferson College）学习，1857年毕业。1860年求学于阿立甘（Allegheny）美西神学院。狄考文在1860年12月12日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我做传教士工作的念头由来已久……自从我进入神学院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更坚定了做一名传教士的信心……现在，我差不多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对我来说，做一名传教士是我的职责。"（丹尼尔·W. 费舍，2009：24—25）在神学院毕业前两周，即1861年4月5日，狄考文向长老会海外布道会正式递交了赴海外传教的申请书，4月13日得到海外布道会的批准，但传教目的地和启程时间没有确定。之后的一段时间，他在俄亥俄州（Ohio）特拉华镇（Delaware）守旧派长老会教堂（Old School Presbyterian Church）担任牧师。1862年特拉华镇马里恩长老会（the Presbytery of Marion）委任其为专职福音传教士。1863年7月，狄考文携妻子邦就烈[①]（Julia A. Brown，1837—1898）以及郭显德（Hunter Corbett，1835—1920）牧师[②]夫妇从纽约乘船出发，历时六个月来到中国，开始长达45年的在华传教生涯。1908年9月28日因腹疾在青岛去世，后葬于烟台毓璜顶。（崔华杰，2008；丹尼尔·W. 费舍，2009：12—26）英国浸礼会曾这样评价狄考文："他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一位优秀的行政管理者、一位极具影响力的布道者，同时又是一位卓越的学者。"（丹尼尔·W. 费舍，2009：218）

（一）在华传教活动

入华初期，作为山东布道区"三位伟大的先驱"[③]之一的狄考文，把宣讲教义、传播福音作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狄考文是通过旅行在乡村和城镇间布道。1864年10月开始在农村旅行布道。此后相继在莱州、潍县、青州、

① 译名参考丹尼尔·W. 费舍（2009）。

② 郭显德，美国来华传教士，在山东生活、传教56年，1920年1月在烟台去世。

③ 指狄考文、郭显德、倪维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1829—1893）。

招远、平度等地传教。城镇布道主要是在街头，利用集市、庙会等人群聚集的场所开展各种布道活动。

由于单纯的旅行布道缺少固定的传教对象，且不能针对个人进行深入持久的宗教引导，狄考文早期的传教活动收效不大，只赢得了为数不多的皈依者。其间狄考文深刻反思自己的传教方式，意识到借助条约权利及西方的坚船利炮扫除传教障碍，只会让当地民众对基督教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福音传播，也认识到仅仅依靠说教很难实现基督教中国化的目标，需要开办教育，培养传教士。

（二）兴办学校

狄考文在华初期传教受挫，促使其调整传教策略和方法，转向开办教育，以培养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人才，培养高水平的中国籍传教士。

1. 创办登州文会馆

狄考文1863年来到中国，1864年在登州（今山东蓬莱）观音堂创办登州蒙养学堂（Te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1864—1876），校址和办学规模几经变迁，后来发展为登州文会馆（Tengchow College，1876—1884），1884年美国长老会差会本部批准文会馆升格为大学。[①] 1904年登州文会馆迁到潍县，与青州英国浸礼会创办的广德书院合并，更名为广文学堂（Kuang-Wen College）。1917年广文学堂与青州的神学学堂、济南的共和医道学堂合并，并迁到济南，这就是齐鲁大学的前身。

文会馆的创办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课程设置方面，除了教学校必备的宗教课程，还有中国儒家经典，同时引进西学课程，其中所开设的自然科学课程“在当时中国的学校中处于领先地位”，所开设的心灵学、是非学和富国策三门社会科学课程“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中最早开设的课程”。（王忠欣，2000：37）登州文会馆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传

① 也有学者认为是1882年。

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培养出了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的新式人才。1898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大学堂，由当时外务部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①] 聘任八名文会馆毕业生任教习。这足以说明文会馆在当时的影响。

2. 编写教材

1877年，狄考文因在基督教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在传教士大会上被推举为“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委员，负责基督教学校的教科书编译工作。狄考文根据文会馆编写教材的经验和体会，10月在基督教专业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发表文章，探讨新式教科书的编写原则及方法。他认为编写教科书的目的是用来研究和教学的，教科书的编写应该有系统，提供重要事实与原则、问题与解答，教材内容应该涵盖全面，要用通俗的语言进行表述，而且还要努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崔华杰，2008：102）

在华期间，狄考文编译的著作很多，如宗教类著作有《谁是耶稣》（1870）、《幼童受洗礼记》（1872）、《创世纪问答》（1875）、《倪维思—狄考文赞美诗集》（1877）等；自然科学类著作有《代数术》（1877）、《形学备旨》（1885）、《代数备旨》（1891）、《笔算数学》（1892）、《术语概要》（1904）、《高等代数》（1908）等；语言学类著作有《官话类编》（1892）、《官话简明教程》（1901）等。

《官话类编》是为了帮助传教士更好地掌握汉语，专为来华传教士编写的汉语教材。据《山东登州文会馆》记载，狄考文刚到登州时，“语言不能传译，乏人，官话课本又无佳音，乃延齐人为傅，苦心学习，随笔记录，必详必慎，以十年之心血，集成一巨著”。“及至全书告竣，陆续复印，一纸

① 丁韪良，来华美国长老会牧师，曾担任过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负责人，著有《万国公法》《富国策》《格物入门》等书，1916年在北京去世。

内行中外咸惊”，“卒成为一空前绝后之杰作，西人之肄学华语者，莫不奉为至宝”。（李蕊，2010）《官话类编》是20世纪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必备之书，据说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也是通过自学《官话类编》过了语言关。

（三）主持翻译《圣经》和合本

《圣经》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官话和合本）之前虽已出版了许多中文译本，但大部分版本是以文言文为基础，且在用词和翻译原则上存在差别，为此重译《圣经》已成为传教士的必然选择。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第二次全国大会在上海召开，决议统一圣经汉语译本，成立了文理（文言文）、浅文理和官话三个译本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译本的翻译。狄考文负责官话和合译本的工作，并被任命为官话和合译本委员会主席。1898年开始翻译《新约》，于1907年完成修订并出版。遗憾的是《旧约》只翻译了诗篇部分，狄考文去世了，其余部分的翻译工作在富善（Chauncey Goodrich，1836—1925）主持下到1918年完成，1919年出版，原来译经修订委员会中只有富善一人见证了该书的问世。

《圣经》官话和合本是“中国教会最受欢迎的《圣经》版本”（顾长声，1991：437），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被海内外誉为最规范的白话译本。官话和合本委员会前后共召开了八次会议，每次会议时间都超过两个月，其中一次持续了长达半年之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诸多困难，狄考文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如狄考文70岁生日时在一封题为“致家中挚爱的亲人们”的信中所写的：“我在中国的最后10年所做的重要工作一直以《圣经》官话和合译本为主。这是一项最费力、最艰苦的工作，至今还未结束。”（丹尼尔·W. 费舍，2009：176）

在最初提出的翻译规则中，狄考文主张“字词应当是操官话的平民百姓

日常所使用和明白的，书面用语和不大通用的用词应该避免”，“文笔风格应是真正的中文，外国人所撰写或监督的官话往往在用字和习惯上多少有些洋化”。（邢梅，2012：28）富善在悼念狄考文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出于对真理的追求，没有任何人像狄考文博士那样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艰辛的工作或者说如此投入。他对译文与原文保持一致、保留原文修辞上的美感所做出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丹尼尔·W. 费舍，2009：215）

二、《官话类编》概览

主要介绍《官话类编》的版本、编排体例和内容三部分。

（一）版本

狄考文于1867年开始准备编写《官话类编》，直到1892年第一版问世[①]，花费了25年的时间，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进行过多次修订与重版印刷。1898年第一次修订，其后有1900年本、1903年本；1905年第二次修订，1906年发行第三版，其后有1909年、1922年重印本。据李蕊（2010）介绍，上海市徐家汇藏书楼藏有 1909 年和 1922 年两个版本。[②] 此次影印使用的版本是《官话类编》1900年本，由上海美华书馆（Shanghai：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出版，781页。

《官话类编》还有两本配套教材，即《官话简明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1901）和《官话类编》（删节本）（*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 (abridged edition): Based on Idiom*，1916）。

---

①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早期版本，书名页竖排居中标有“官话类编”四字，右边竖排写有“耶稣降世一千八百九十二年”，左边竖排写有“岁次壬辰 美华书馆镌印”，全书200课，188页，只有中文课文，没有前言、目录、作者名讳、英文翻译、注释。

② 据李木谢子（2011）介绍，上海市徐家汇藏书楼还有一本非对外发行的手抄法文本《官话类编》（*Cours de Mandarin*），抄写于1893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